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一辑

商务印书馆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一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

1987年·北京

出版说明

比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依据。比较经济学既着重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强调个例的考察和应用经济的分析。

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历史并不很长。尽管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古典经济学家早就采用过比较方法来探讨不同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问题，但比较经济学的产生通常被看成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兴起，以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政府调节经济的措施，这一切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领域。诸如“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比较、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国有化和经济效率的变动的研究、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适用性的探讨等等，越来越成为比较经济学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

在这一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中，共选入七篇有关最近西方比较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它们分别从理论、现状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一定课题的阐述。

克里斯·马登的《比较经济制度》是他与其他经济学家合著的《比较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的第一章。它主要提出了比较经济学的

一些方法论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比较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读者对比较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概况有一较系统的了解。

与此相似的是约翰·克鲁德森的《西方的混合经济》。这也是上述《比较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的一章（第四章）。它除了对若干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分析而外，还进一步就政府对经济的不同干预方式进行了考察。它指出，这些不同的政府干预方式是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必然要涉及对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的评价问题。

菲利普·汉森的《进口带动的增长已经终结了吗？》一文和戴维·A·戴克尔的《权力分散与指令原则》一文，原载《比较经济学杂志》。这是两篇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作者们的观点是相当清晰的，即认为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不利于经济的稳健的增长，也不利于对宏观经济的合理的控制。因此作者们主张增加市场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菲利普·汉森所指出的，在波兰，当七十年代政府对价格和收入的集中控制放松之后，不但国内需求过于膨胀，而且国际收支状况也大大恶化了。这意味着，问题不仅仅在集中管理体制方面，也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雷蒙·W·哥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和发展的国际数量比较》一文，是专就金融的国际比较方法论进行论述的文章。作者认为，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分析一国金融制度是否对本国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起过作用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分析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作者列举了这一比较研究的困难所在，并对如何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弗雷德里克·C·莱恩的《政府在近代初期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和乔尔·莫克里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低地国家的工业革

60630/10

命》这两篇论文，是比较经济史领域的作品。作者们根据工业化初期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对政府的作用和某些国家工业化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莱恩的文章以及该文后面附录的诺尔斯、托马斯二人合写的简评都提出一个论点，即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如何通过对比较对象的选择来说明问题。这一点之所以有重要意义，因为统计资料在比较研究中总是感到不充分的，如果不在方法论上进行新的探索，那就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由于本辑收集的这些论文的作者，无论是研究西方经济的还是研究苏联东欧经济的，都未能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并且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有不少错误的解释，因此他们的论述至多只能作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的一种参考。至于象克里斯·马登那样在《比较经济制度》一文中和约翰·克鲁德森在《西方的混合经济》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描绘，则更为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和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掩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但在涉及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的经验教训等方面，所有这些作者的一些看法仍有可供参考之处。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西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加以利用。

目 录

- 比较经济制度 克里斯·马登 (1)
西方的混合经济 约翰·克鲁德森 (37)
进口带动的增长已经终结了吗? —— 苏联、波兰、匈牙利七十年代经验的评论 菲利普·汉森 (102)
权力分散与指令原则——从苏联经验中汲取的一些教训 戴维·A. 戴克尔 (123)
金融结构和发展的国际数量比较 雷蒙·W. 哥德斯密斯 (151)
政府在近代初期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弗雷德里克·C. 莱恩 (172)
十九世纪上半叶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 实例比较研究 乔尔·莫克里 (186)

比较经济制度

克里斯·马登

生活水 平

生活水平的定义

你想怎样描绘 10 年后你所向往的生活水平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会立即想到有形货物和劳务的享受，诸如能有舒适的住房、大型轿车和经常夜出去娱乐等。然后他们开始谈到更为抽象的生活质量如生活安静、空气新鲜和惬意的环境。有些人会继续考虑他们在工作和闲暇中时间的利用以及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满足。那些盼望从工作本身得到满足的人或许不大重视用工资收入购进物品来享受。其他人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以长时间工作来积累财富，他们就没有时间享乐了。而另一方面，运气不佳的人会觉得奇怪，当他们每天只图温饱，别无他求的时候，有人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生活水平作出明确的界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经济研究的中心。自从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写出他的巨著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曾经不断地探索“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政治家们迫切期待他们的发现，以便制定政策，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当然，大部分政治上的争论都关系到国家产品怎样分配才算可取的问题。随后，总要强调这样一点，即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在

有些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在一个国家里，就个人或团体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因此，不用大惊小怪，所有政治家都了解‘经济增长’这一不可思议的概念和寻求增加国家总产量的方法。

生活水平的衡量

假如经济学家们想要顺利进行生活水平的比较研究，以便了解它们的原因，提出提高它的方法，就必须对“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个定义并加以衡量。有关这类衡量的问题是它只能包括能够衡量的东西。至于象环境好坏这样一些难以衡量的生活水平方面是不应该忘记的，这对为了提高能够衡量出来的生活水平而可能牺牲难以衡量的生活水平的地方，尤其应该如此。

最容易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方法就是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它是计算出一年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及劳务的价值，然后用它的消费人数去平分。这种产量的价值可以假定等于由生产得来收入的价值，因为不以工资、利息或租金形式支付的价值是留作利润的。表1提供了各国的数字，其中包括本书以后部分将详细讨论的数字。

表1 估计1977年按人口平均以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科威特	12,270	法 国	7,290
瑞 士	9,970	荷 兰	7,150
瑞 典	9,250	日 本	5,670
挪 威	8,550	民主德国	4,680
美 国	8,520	联合王国	4,420
加 拿 大	8,460	捷克斯洛伐克	3,890
联邦德国	8,160	意 大 利	3,440
丹 麦	8,040	苏 联	3,020
比 利 时	7,590	印 度	15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9年第126—127页。

用作比较，这些数字的主要缺点是它们都要按照当时的外汇率换算成美元。外汇率是受贸易力量以及影响不同货币供求的其他因素决定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外汇率不一定反映出货币的购买力。1977年，联邦德国和美国的旅游者用在外汇市场上廉价购买来的英镑在英国大街的商店购买物品时，感到生活过得很好，不过，这是因为回到家里他们的马克和美元就购买不了这么多东西了。然而到了1979年，欧洲人包括英国人能在美国很便宜地度着假期。

为了更好地比较生活水平，我们就需要根据收入金额所能买到的物品把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另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联系起来。按照理想，我们需要的这种购买力外汇率是从比较英镑联邦德国马克、美元等货币在有关各国支付购买相似数量的货物及劳务的花费中计算出来的。这样，我们才会得到每个国家公民平均能够消费多少的概念。

对相似类型的国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容易的，不过，由于气候、文化、其他地理因素，防御以及其他政治需要的不同，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消费类型，比较货物及劳务数量的问题变得日益困难。人均收入并不能衡量每人的个人消费。假如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法衡量他们的国民收入也是一个困难，例如苏联不将劳务价值列在总数之内（注意：在表1.1中苏联的数字是将劳务的估计包括在内的）。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活动没有记录下来。这部分地是因为记载不当或根本没有记载，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因为家庭和村落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大部分货物和劳务的供给不是用分工精细的工业经济的衡量方法付酬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印度每人收入非常低的数目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消费水平。虽然印度人可能贫穷，

但是如果认为他们平均每生活水水平不足英国每人消费水平的5%则是荒谬可笑的。奇怪的是，这种实际的和所记录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差异正在英国发展，可能在其他西方经济中也是如此。这是由于“黑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所谓“黑经济”是指不作记载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指为了逃税的经济活动象“兼职”和以现金支付的私人劳务等。

即使这些比较问题能够克服，它仍然剩下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少数人消费大量国家产品的国家里，人均收入可能不是衡量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现实指南。一定要编出收入的次数分配来表示平均收入数目有多大的代表性。

所有这些问题反映出了能统计数字的局限性是多么重要。不审慎的人很容易运用精心选择的数字去迷惑外行。不管怎样，研究经济的执行情况就需要统计学，所以，经济学家的责任之一是要非常清楚地说明他所运用的统计数字的意义。

还有其他一些生活水平的标志，如平均纳入的热量，消费者耐久物品的消费，住房和环境质量，直至总的健康水平。可以想象，包含在生活水平之内的这些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复合指数是会创立起来的。然而不管怎样，提高每人收入是一个国家最具体的、因而也是最好量度的宏观经济目标。所有国家都关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每人收入数目将继续被用来作为进步的证据。

由此推断，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对所有国家说来都是重要的。在有些国家，或许是大多数国家，它的重要性是首要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和其他社会目标比较起来，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目标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可以论证，在这些国家里，克服物品短缺的动力已经变成迷恋积累越来越多的物体，而不管这样是否能够导致更加幸福或满意的生活。很可能，生活水平方面的这样“幸福”一旦其最基本部

分已经达到，便不是和绝对的收入水平相关，而是和相对收入水平相关，所以它并不因人们物质上的日益富裕而有所增进。假如这种情况能够检验并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它一定会给发展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国际上的再分配政策，以及保护世界资源问题以重大的启示。

提高生活水平

既然提高每人收入的共同目标已经确立，就必须区分收入或产量的实际水平或可能达到的水平。实际收入水平简单说来是目前出现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产量的价值。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种水平是受总需求决定的，因为生产要素的雇主们除了要求他们的产量之外，仅仅雇佣他们，付给他们报酬。政府是能够干预总需求的，比如增加它们自己的开支以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经济部门就能全部开动，就能生产出它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换句话说，能够生产全部产品。

一个国家可能的产量是靠它拥有资源的质和量。它们包括土地肥力、矿产含量、土地的地理位置；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企业质量，进行生产和分配全部过程的组织和计划。在我们调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时，这些都是探求的最重要的因素。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和政治的种种考虑，它们也能制约经济活动，从而限制可能的产量。这发生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在如何对待牛的问题上，传统信仰就有很大的力量。使人均收入最大化在某些情况下就可能和保持现存社会秩序和习惯发生冲突。而后者很可能更受到重视；经济学家们在指出二者所包含的选择和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把问题留下来由存在的不管什么政治过程去作出价值判断。这一点在下一节里将作充分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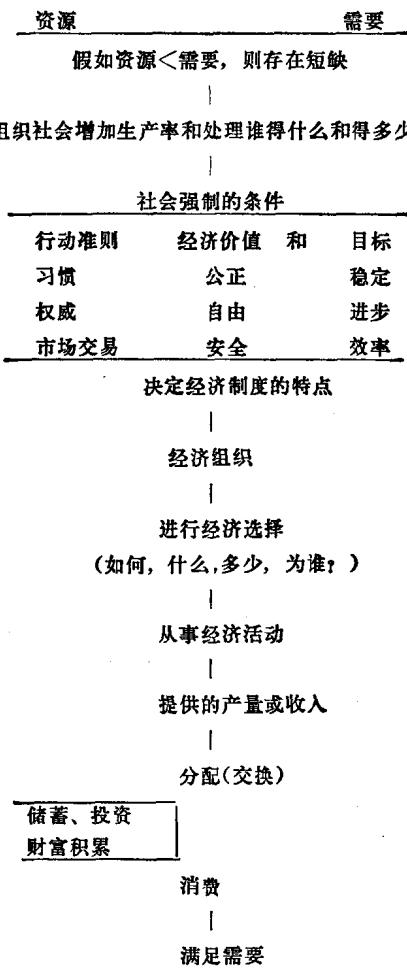
提高可能的产量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需求管理政策能将产量从低于可能的水平提高，但是，进一步的，持续的提高则需要经济发展。这就要增加可利用的资源的数量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任何经济或许都有“自然”增长率。有人提出，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尽可能地发展经济以促进这一增长，可能是大多数政府的一个目标。这将使这些政府，不管其经济制度如何，致力于宏观经济管理。这意味着力图影响投资、消费和储蓄这样一些事情的整个水平。

比较经济学——基本思想

比较经济学是研究不同经济如何解决短缺这一首要的经济问题。尽管提高生活水平已经提作共同的目标，但仍然可以发现对它的含义可能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可能通过不同途径来达到它。通常认为，每种经济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消费者的需要则是无限的，二者的差距就是短缺的程度。大多数经济学家关心方程式中“资源”这一边。他们提出一些可以更多获得资源的方法。他们还提出怎样更加有效地利用它们。不过，近来由于日益担心商品的真正短缺，较多地关心“欲望”这一边了，考虑怎样来限制欲望，至少要使它朝着非物质方面发展。

图1概括了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当比较不同经济的时候，对所探求的内容给予有益的指导。现在对它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很早以前，人们认识到增加全体的福利在生产中进行合作的好处，但是这既要求组织好生产过程也要求组织好产量分配。原始时代，人们学会集体狩猎，并发展了劳动分工，但是因为物品短缺（没有人能够享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也必须规定每人的所得。这就是处理谁得什么和得多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以是暴力、共同同意

图1 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资料来源：根据苏扎恩·赫尔本教授 1979 年在坎特伯雷经济联合会提出的短文
摘编而成。
或二者兼用。

没有短缺就没有问题。由动物世界类推说明了这一点。我们
发现一群狮子在捕杀猎物中进行非常有效的合作，然后和平地一

起吃它们所需要的一切。生产组织使它们获得共同的利益，不过，这是因为食物是丰富的，而狮子的需要又是有限的，这里不存在处理谁得什么和得多少的问题。假如食物短缺，无疑地这群狮子就会为第一口食物而争夺，“适者生存”的“定律”将起作用。如果观察一下这是不是反过来会导致生产组织（合作捕杀猎物）的崩溃，从而进一步减少食物的供应，那将是饶有兴味的。

管理生产，谁得什么和得多少的方法要靠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这个制度的社会强制条件。社会强制使我们按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行事，从而社会能够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

社会强制是指准则、价值观念和目标。准则是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服从它们就会做到“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儿童时代从家庭、朋友和学校学会接受许多准则。还有其他一些准则变得更加正式，被制定成法律。这些法律有明显的制裁做支持，不过，不成文的规则也是考虑一下我们的行为有多少要受到与朋友和睦相处和取得朋友的赞许所约束；再考虑一下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受人欢迎，在被社会摈弃时怎样作出反应；就会知道社会准则的强制作用了。价值观念和目标是社会对善恶的看法和大家所应追求的东西。

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受社会准则、价值观念和目标决定的。这些东西是通过社会政治制度公开表现的。要想了解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别，首先要了解在它们背后起作用的政治和社会的力量。例如，一种经济制度可能基于法律条文和多年演进而来的行为规范，在一定限度之内，个人可以保持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个人“市场交易”的成功（即把他的劳动和他拥有的其他生产要素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决定他从全国产量中应得的数量。这种制度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奏效，这个社会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认为为了效率和进步鼓励这样的自由是必要的。另外一种制度可能比较着重

强调稳定、安全、正义以及公平的意识，这就需要对个人自由作某些限制。还有一种经济制度，在原先导致革命的社会变革的社会强制崩溃之后，摒弃了旧的习惯、市场交易的思想和个人自由。通过权力（它最初用严厉制裁来维持直到建立新传统），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就和新的价值观念与目标共同建立起来。

经济组织如公司、银行、工会和政府机构是它们在其中活动的那种经济制度的产物。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视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定。经济选择是在经济组织之中通过组织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每一种经济制度中都一定要作出这些选择：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对生产过程的资源分配）；如何生产？（生产过程的效率）；和谁将获得所生产的东西？（收入的分配）。很简单，这种选择可以留给价格结构，比如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或者集中管理，比如在中央管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中；或者以任何比例分属于上述二者，象在混合经济中。

作出这些经济选择将决定经济活动以及它所创造的产量或收入的性质和水平。这包括决定消费与投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不同消费者之间的产量或收入的分配。在每种经济中，什么样的需要能够满足的问题就这样加以解决。在解决这一首要问题的方法中，每种制度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考察这些问题以及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提高生活水平的全部目的是本章其余部分的任务。

自由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无形的手”

在国民收入的有限范围内，必须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以及产品归谁的选择。早期的经济思想家奇怪，在没有明显指令系统或机构的情况下，是怎样作出这种选择的。是谁决定是用煤来

炼钢或用于室内取暖，乃至是否用煤？与人们购买物品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事先定购，他们想买的东西就已经摆在商店里等候他们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亚当·斯密把它叫做“资本主义无形的手”，他接着描写了这种经济的“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如果一切事情运转“完善”，资源分配将尽善尽美。

为了了解完善的市场模式的含义，不急于去批评它不切实际的假定是很要紧的。例如，公司不能一夜之中把生产要素从生产一种产品转成生产另一种产品，从而对资源进行再分配，将资源从亏损部门转到盈利部门，这一事实会引起粗心的研究者不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就放弃整个完全竞争的理论。这样一来就会抓不住这个模式的要点，不认识它对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这一模式的精髓是：随着公司自由出入来追求有利时机，消费需求的类型将会以反映边际成本价格的有效方式得到满足。这些边际成本是全部生产的机会成本。竞争将保证成本刚好保持在能使公司获得“正常”利润的水平上。只要消费者准备付给反映产品机会成本的价格，他们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当生产者为了回答独立自主的消费者无数信号而寻求资源的时候，资源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

消费需求的类型是每个人的意愿和购买能力相结合的总和。所有消费者都有偏爱不同货物及劳务的类型。他们的需求既要根据这一点又要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国家的资源一方面提供产量，另一方面又提供物主的收入。每个适龄的劳动者都拥有一种生产要素。大多数人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或事业心，而另外一些人则拥有土地和资本。在完全的市场模式中，一种生产因素获得的收入要根据它的产量的价值。所以每个人都能消费国家产量中他得到的一份。这一份是和他或她所作出的贡献有关的。

收入的分配问题

这是市场经济(政治上通常称作资本主义)的基础。在这个制度中，相对的收入水平，从而消费水平取决于生产诸要素的占有。大部分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的提出就是根据这点理由。喜欢生产效率高是很好的，喜欢按照能反映机会成本的价格满足消费者需求(一种“最优”的解决办法)也是好的，不过，它对谁“最优”呢?……只有对那些十分幸运继承了土地、资本或者有熟练的手和脑的人最优。在这个制度中，只有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收入和财富分配愈不平等，这个制度在分配资源中就愈趋向为富人分配奢侈品而不为穷人分配必需品。

在这一点上是经济学家在辩论中表明他的政治色彩的时候了。如果他明确他的价值判断的性质，就没有人对这样做感到羞愧。正是认识到政治争论不能离开对完全竞争和价格结构这些领域的分析，才导致一再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

政治学被说成是“可能性的艺术”，而经济学是“关于有限手段应付种种竞争目的的科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假如收入的分配总的来说是能接受的，不管这种分配是人民同意的，还是强制进行的，资源的分配就才能说是最优的。假如不是如此，政治学将会要求进行改革，不管现存经济作用的成效如何。

其他问题

即使收入分配是可接受的，但由于下文所述还不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

1. 垄断 市场模式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假说就是公司总是选择更加有利可图的，而不是利润较小的结果。因而他们总会将资源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种利润最大化的假说也意味着成本最